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四辑

日本学者
西南少数民族
研究述评

王晓梅 ◎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 第四辑

日本学者
西南少数民族
研究述评

王晓梅 ◎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日本学者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述评 / 王晓梅著. -- 贵阳 :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7.5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第四辑)

ISBN 978-7-81126-999-4

I . ①日 … II . ①王 … III . ①少数民族 — 研究 — 西南地区 IV . ①K2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4940号

日本学者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述评

著 者：王晓梅

出 版 人：闵 军

责 任 编 辑：滕 芸

校 对：张 萌

出版发行：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深圳市和谐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毫米×240毫米

印 张：18.25

字 数：273千字

版 次：2017年5月 第1版

印 次：2017年5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26-999-4

定 价：36.00元

版权所有 违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851-85981027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本书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17年度）

编者的话

中国的文化地理，可以作多种的解读：以秦岭为界，以北为北方旱地小麦文化，以南为南方稻作文化；以瑷辉—腾冲划线，线之东为农耕文化，线之西为游牧文化；以地方特色名，又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大而划之，又可分为三种文化圈或称为文化版块：蒙藏的佛教文化圈、新疆的伊斯兰教文化圈，除此而外，所有版图均为儒家文化圈。于此编者所欲说明者，处儒家文化圈内的云贵、湘西、桂北，似乎更应该独立为“巫文化圈”。巫文化是中国文化源头之一。上古之时，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立庙堂，而后独尊史官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一统天下之势，“巫”的处境每况愈下：被逐出庙堂、逐出中原，退而居于西南一隅，在土著中苟延。如此看来，西南土著中保有的巫风，恰是中华文明的渊源之一。

贵州现已建省 600 年。昔以中原为中心的儒教文化依“五服制度”分野，贵州地处“要荒”，位列边缘。但若以“巫文化”视之，贵州却正是“巫文化圈”之中心，所谓“西南之奥区”。在中原失落了的巫文化体系，恰好在贵州得以保存。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梳理，可称上符“礼失而求诸野”的古训。

以人类学的眼光看贵州本土文化，大概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 世纪末，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传入中国，贵州就成为重要的对象研究地。从早期的传教士、西方学者，到中期的国内学者再到近期的本土学者，文化人类学在贵州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并形成了大批成果，成为了研究贵州省情和地域文化特征

的重要视角。我社将用六年的时间，以每年一个专辑十本的速度，对以往的贵州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作一爬梳，选编出六个专辑共60册一套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以“六十名著”诠释“六百年贵州”。

作为分外之想，我们期望这套丛书成为研究贵州文化史和少数民族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库，如同我们的先辈文通书局曾出版的“黔南丛书”一样，我们期以此套出版物能够推动地方文化史和贵州的“原生”精神文明的研究，甚至促成“贵州学”和“贵州学派”的诞生。

王晓梅，女，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理事、贵州省日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先后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贵州省社科基金项目多项，有关成果曾获贵州省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贵州省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目 录

绪论.....	001
第一节 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学术意义.....	001
第二节 日本民族学之发展概略.....	005
第一章 晚清时期日本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015
第一节 晚清时期日本的西南踏查.....	015
第二节 鸟居龙藏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024
第三节 鸟居龙藏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影响.....	045
第二章 民国时期日本学者之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056
第一节 民国时期日本对西南地区的调查.....	056
第二节 民国时期日本学者之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063
第三章 1950—1980 年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077
第一节 日本学者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史的研究.....	078
第二节 日本学者关于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	094
第三节 日本学者之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传说研究.....	098

第四节 “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会”的研究.....	111
第五节 东南亚研究与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之关系.....	116
第四章 1980—1990 年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121
第一节 “照叶树林文化论”与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122
第二节 “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会”的新成果.....	139
第三节 年轻一代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142
第四节 日本学者对中国国内研究动向的追踪.....	169
第五章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175
第一节 关于迁徙、汉化、民族关系及民族认同的研究.....	187
第二节 日本学者关于西南少数民族观光的研究.....	207
第三节 日本学者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史的研究.....	216
结语.....	232
参考文献.....	238
日文文献.....	238
中文文献.....	277
后记.....	282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学术意义

一、研究范围的界定

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但凡对世界地理稍有兴趣者均可脱口而出。若问全世界有多少个民族，却很难轻易作答。究其原因，我们不得不说，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民族”一词的概念不清，涵义不明，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的说法。有时人们把它与“国家”(nation)相联，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滋生的土壤；有时又把它与“族群”(ethnic group)视作一体，成为文化与身份认同(identity)的标志。^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了民族平等的政治原则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在此基础上，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经过国家政治认定成为具有民族资格的群体。本书以西南地区经过国家认定的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尚未认定的群体不在本研究的考察范围之内。

关于西南地区的范围，正如何明教授所言，“西南是一个具有多项意指的范畴。最初也是最基础的含义为地理方位，指中国的西南部，但其边界在何处是不确定的，具有模糊性。以此为基础，衍生出所指各不相同的语用。其一是文

^① 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民族语国家的边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2.

化地理或族群地理意义上的西南；其二是行政区划上的西南；其三是经济意义上的西南；其四是政策上的西南。”^①为研究之便，本课题将西南所指范围限定在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滇、黔、桂三省以及四川邻近云南的部分地带。

从时间跨度而言，本课题以晚清时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鸟居龙藏博士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历时7个月有余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为起点，着重考察20世纪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便于国内学者及时把握日本学界的发展动向和最新成果，亦将日本学者在跨入21世纪后取得的重要成果纳入研究范围之内。

二、研究内容

日本学术界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外国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②为更准确、科学地把握百余年来日本学者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概貌，笔者根据各时期的研究重点和时代特性，将日本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 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之萌芽期

晚清、民国时期，以鸟居龙藏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为配合日本政府的大陆扩张政策，纷纷前来中国西南考察，留下了大量的旅行日记和不少研究论著，尤其是鸟居龙藏关于西南少数民族、中南半岛民族以及日本民族之关联的研究和阐述，更为战后日本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热潮奠定了基础。

2. 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之成长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为探明日本民族文化之源流，理清西南少数民族之谱系，复原华南文化史，以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为核心的华南文化史研究成为战后日本民族学研究的重心，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历史民族学研究方法应运而生。在不能前来中国大陆进行田野调查的时代，

^① 何明. 从殖民主义、民族危机到民族国家重建、文化自观[J].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2009 (06): 1-4.

^② 未成道男. 中国文化人類学文献解題 [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5: 24.

日本学者便到东南亚大陆地区考察从中国西南迁徙过去的少数民族，在南诏大理主体民族研究、瑶族研究、明清土司制度研究、中日神话传说比较研究领域取得璀璨业绩。

3. 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之开花期

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年可谓日本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开花期，以“照叶树林文化论”“东亚半月弧”理论为代表的日本民族文化寻根研究将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潮。另一方面，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民族学者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积极引入新方法、新理念，将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从民族文化源流研究一边倒的情况引向更加多元的研究之中，日本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迎来了全面开花的隆盛阶段。

4. 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之丰收期

9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环境的不断改善，国际形势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本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进一步从日本民族文化寻根研究中脱离出来。受世界人类学发展动向的影响，以迁徙、汉化、民族性、民族文化、民族认同、民族信仰、民族观光等为核心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成为热点。伴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掘和利用，日本学者在西南少数民族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大量研究论文与研究专著的面世，使得日本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也在一个多世纪后迎来了硕果累累的丰收期。

三、学术意义

20世纪以来，日本涌现出以鸟居龙藏、白鸟芳郎、河原正博、村松一弥、伊藤清司、君岛久子、佐佐木高明、竹村卓二、铃木正崇、曾士才、武内房司、塚田诚之、松冈正子、长谷川清、横山广子、吉开将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从事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优秀学者，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就整体而言，研究内容极为深入，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历史民俗、生业形态、物质文化、民族系谱，还包括神话传说、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民族认同、民族表象以及跨境民族等等，由此诞生了众多研究视角独特、学术价值极高、国际影响相当广泛的研究成果。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这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机遇。怎样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构建起一个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社会，并切实有效地维护、保护好我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使之永久地传承下去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课题和艰巨任务。在此背景下，吸收借鉴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全面、正确、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抢救与整理我国少数民族悠久而灿烂的传统文化，开发、整合和利用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资源，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学者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早在1936年，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便被中央编译局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黄才贵^①、黄来均^②、林宗成^③、刘愚山^④、金少萍^⑤、张正军^⑥、白庚胜^⑦、贺学君^⑧等学者分别就鸟居龙藏的苗族研究、佐佐木高明的照叶树林文化论、白鸟芳郎、竹村卓二等人的华南民族文化研究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等进行过介绍，但与日本学者浩瀚如海的研究成果相比，既有的译介成果俨然只是冰山一角，关于民国时期以及21世纪十年来的成果介绍几乎可谓空白。

① 黄才贵.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② 白鸟芳郎著，黄来均译.东南亚山地民族志[M].昆明：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1980.

③ 白鸟芳郎著，林宗成译.关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问题[J].民族译丛，1984（04）：50-52.

④ 佐佐木高明著，刘愚山译.照叶树林文化之路：自不丹、云南至日本[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⑤ 竹村卓二著，金少萍、朱桂昌译.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⑥ 张正军.文化寻根：日本学者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⑦ 白庚胜.谈谈日本的纳西东巴文化研究[A].郭大烈.纳西族文化大观[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657-670.

⑧ 贺学君.中日中国神话研究百年比较[J].文学评论，2001（05）：149-154.

依笔者管见，以松本信广、大林太良、塙田诚之、铃木正崇、吉开将人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学者的优秀成果，有的角度观点新颖，有的结论富于创见，有的考证邃密且富有特色，然而，他们的新知灼见却未能及时地被翻译成汉语加以引介，部分译成汉语的研究成果亦为零星分散、欠体系的介绍，甚或存在不少漏译、误译情况，译介质量令人堪忧。我们不得不承认，语言已然成为横亘在中日两国学者之间最大的障碍，极大地影响和限制了两国民族学界的互动交流。

中日两国民族学界相互交流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是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构成；其次，不同社会、不同国家的民族学，同时也是不同民族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其间的差异既可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民族学者在民族、文化问题上认识的异同，又能折射出不同的文化传统、学术视野乃至基本国情的差异。

基于上述目的，本书旨在对 20 世纪以来日本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梳理，着重介绍日本学者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领域取得的突出业绩，从而丰富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弥补我国学者的不足，同时对我国民族研究相关学科的发展和创新、对我国方兴未艾的海外民族研究以及我国边疆民族研究和治理创新转型提供一些来自外部他者的基础性研究资料和跨文化思考。

第二节 日本民族学之发展概略

日本民族学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治初年。对日本而言，民族学也是传自西方的舶来品^①，与中国相比，其传入时间大约早 30 年。按日本学界的惯

^① 瞿明安主编. 现代民族学（下）[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368.

例，日本民族学的发展通常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①。

一、民族学的启始阶段（1884—1933年）

日本早期的民族学深受美国生物学家、考古学家爱德华·斯维斯特·莫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和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西博尔德（Heinrich von Siebold）的影响。^②

1877年6月，莫尔斯应东京帝国大学外山正一教授（后任东京帝国大学第四代总长）的邀请赴日任教。在乘坐火车从横滨驶往东京新桥的途中，莫尔斯发现了有名的大森贝塚。在征得日本文部省的同意后，莫尔斯主持了对该古迹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此次发掘不仅是日本首次以科学的方法研究贝塚，同时也迎来了日本考古学和人类学发展的黎明。^③

西博尔德的父亲早在1822年就来到日本，其兄长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外相井上馨的秘书，西博尔德于1869年随兄长赴日并在考古学上取得突出成就。通过对阿伊努族的调查以及对大森贝塚等史前遗迹的研究，西博尔德指出了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的复合性。

明治时期的这两位外来学者不仅把西方系统的考古学方法介绍到了日本，更重要的是，由此确立了日本民族学在明治、大正时期的一个重要课题，即日本民族文化的起源问题。由于这种特殊的联系，日本民族学从诞生伊始便与考古学结下不解之缘，从而形成日本早期民族学的一大特点。

1884年，尚在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动物学科学习的坪井正五郎发起筹建了东京人类学会（1941年改称日本人类学会），1886年，学会会刊《人类学杂志》创刊，坪井正五郎、小金井良精、鸟居龙藏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东京人类学会是一个包括医学、考古学、民俗学和体质人类学等在内的综合性学

^① 丸山孝一. 日本民族学与民族教育学研究的当前形势和任务[J]. 民族教育研究, 1998 (02) : 78-81.

^② ヨーゼフ・クライナー. 日本民族学・文化人類学の歴史[A]. ヨーゼフ・クライナー. 日本民族学の現在[C]. 東京: 新曜社, 1996: 3.

^③ 梅溪昇. お雇い外国人——明治日本の脇役たち[M]. 東京: 講談社, 2007: 162.

术组织，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从语言到文化、从考古到形体，从家族制度到村落组织，从原始宗教、民间信仰到衣食住行和传统习俗，无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研究对象起初在日本国内，甲午战争后，迅速拓展到周边国家和地区。

1913年5月26日，被尊为日本“人类学之父”的坪井正五郎客死俄罗斯圣彼得堡。此后，学会成员分作两派，人类学会成为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基地，而一些对民族学、人类学、史前史感兴趣的青年，如冈正雄、吉野清人、江上波夫等，则于1925年成立了一个叫做“APE”会的学术团体，“APE”分别代表着人类学“Anthropology”、史前史“Prehistory”和民族学“Ethnology”。

二、民族学的创建阶段（1934—1945年）

1934年11月，日本民族学会在东京成立，东洋史学权威白鸟库吉教授被推选为首任会长，会刊《民族学研究》也于翌年正式刊行。1942年，以冈正雄等为中心的“APE”会在具有军方背景的文部省的支持下组建了国立民族研究所，日本民族学会作为其外围组织改组为财团法人民族学协会，“奉命支持民族学研究所收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民族志资料”。^①

正如众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日本民族学从其成立之初就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殖民地经营有着密切联系。^{②③}冈正雄就曾明确表示，“民族学旨在弄清作为统治对象之民族的状况，以满足民族统治方面的政治期待。”^④因此，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内各民族为对象的研究遂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民族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从1943年到二战结束，日本民族学研究所多次派出调查组到中国、中南半岛、马来半岛、爪哇、苏门答腊等地进行实地调查，今西锦司、梅棹忠夫、石田英一郎等对我国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进行的调查，移川子之藏、宫本延人、马渊东一等对台湾地区高沙族进行的调查，松本信广等对东南亚地区开展

^① 丸山孝一. 日本民族学与民族教育学研究的当前形势和任务[J]. 民族教育研究, 1998 (02) : 78-81.

^② 周星. 殖民主义与日本民族学 [J]. 民族研究, 2000 (01) : 47-57.

^③ 麻国庆. 现代日本人类学的转型和发展 [J]. 民族研究, 2009 (01) : 41-50.

^④ 周星. 殖民主义与日本民族学 [J]. 民族研究, 2000 (01) : 47-57.

的实地调查，可以说是日本民族学服务于日本殖民统治、殖民扩张的典型事例。1945年8月，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日本的民族学研究亦告短暂中断。

三、民族学的重建阶段（1946—1964年）

1946年，以涩泽敬三^①为中心，开始了日本民族学协会的重建工作。同年9月，《民族学研究》杂志复刊。1947年，民族学协会与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考古学、心理学、地理学、语言学和宗教学等九个人文社会科学学会组成联合会，每年在日本不同地区实施联合考察。

1949年以后，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南山大学、东京大学和东京都立大学的课程设置之中。出于对战争期间民族学沦为殖民统治御用之学的深刻反省，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采用了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的概念体系，着手该领域专门人才的培养。

为纪念日本民族学协会创建二十周年，1954年，该协会策划了“东南亚稻作民族文化综合调查”项目，于1957年8月、1960年2月、1963年6月先后三次向东南亚地区派遣了以松本信广、岩田庆治、绫部恒雄、八幡一郎等为中心的调查组，对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尼泊尔以及印度中部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与此同时，东京大学亦先后五次向西亚地区派遣了“伊朗伊拉克学术调查团”，向北美地区派出了“安第斯地带学术调查团”；大阪市立大学则先后三次派出了以梅棹忠夫、岩田庆治、石井健二为团长的“东南亚学术调查队”。自此，沉寂一时的海外调查渐趋频繁，不少学者甚至远赴非洲、拉丁美洲等地进行民族学调查，民族学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① 涩泽敬三是素有“日本企业之父”美誉、以《论语加算盘》而闻名于世的涩泽荣一的孙子，曾担任过日本币原内阁的大藏大臣、第16代日本银行总裁等职，同时也是一位民俗学家，为日本民族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